

第九章 虎之门(一)(外务省)

东乡外相的考虑

当时的虎之门有外务省和大东亚省。外务省因原办公楼被焚毁，而租借了这里的文部省，大东亚省则在斜对面，相隔一条电车道的旧满铁大楼(现在的美国大使馆别馆)内。这两个机关原是一部与分部的关系，因工作的区别而渐渐分离。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处于终战边缘的外务省的情况。

众所周知，外务省是和平派的大本营，是和平的促进者。我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机关的主人——东乡茂德外相的身上，从加濑俊一氏(当时的外相秘书官兼政务局第五课，即美国课的课长，后任驻联合国大使，外交评论家)的谈话开始：“我作为东乡与重光的秘书官而开始进入仕途。太平洋战争以来，无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上看，胜任外相的，我想也只有重光和东乡二人，所以东乡不干了换重光，重光不干了换东乡，只能两人轮换，在战争时期实际上确是这样。但真正说起来，他们俩的关系决不是密切的，这有性格方面的因素。有一次，我在和近卫聊天时，偶尔涉及外务大臣的性格，于是我说：‘打个比方的话，重光似快刀，东乡似长矛。’近卫说：‘说得太妙了。那松冈(洋右)是什么呢？’我想了一下，这时他又笑着说：‘那是杆火枪，是个莽撞汉！’

东乡的大学毕业论文大约是《歌德与希腊》，他毕业于文学系，性格温和，但一工作就极严肃，这方面给人以强烈的印象。所以重光不行时，就由东乡取代。尤其东乡是开战时的外相，谙熟外交事务。这次由他担当终战外交，战后，被作为战犯嫌疑送往巢

鸭监狱时，记得他曾这么说过：‘我做了两件戏剧性的事，这就是开战（太平洋战争）和终战。开战有违天理，终战是非常之举，这两件事都办得很顺利。作为外交官，一旦干或者不干这些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最大限度的外交，当然就决定了对你的评价。唉，辛劳一场，最后还报于你啰。’

待到《波茨坦公告》宣布的时候，是否接受这一公告，外务省手忙脚乱。东乡确信这是可行的，我立刻与重光联系。在这非常时期，有重光先生在为好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东乡与重光若不能协力，日本的外交将难以进行。重光也说‘兹事重大，立即出发！’而来到东京。此外，我还与重臣们都进行了联系，常常给近卫、平沼、若槻、冈田及木户等通消息。”

事前对战败史的研究

大野胜巳氏（当时任东乡外相的秘书官，战后任驻美国大使）说：“我任东乡先生的秘书官是在加濑之后（1945年6月20日以后），这是东乡指定的。我与东乡先生有长期的交往，为了准备终战这个最激动的时期，东乡选择了他比较熟悉的我为秘书官。实际上，他还是我们夫妇的媒人。”

据说东乡在1933年2月任外务省的关键职位欧美局长后，突然越过公使、次官，跃升为驻德大使，这是因为有以后任首相的松平恒雄先生的支持。据说在松平任驻美大使时期，东乡任一等秘书，两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虽不长，但松平非常信任东乡。由于松平的大力推荐，所以有了这样意外的事例。但是，这也是由于东乡自己的能力，他总是具有一种哲学上的信念。东乡辞去东条内阁的外相，直接原因是反对新设大东亚省，其实是不满东条之所为。不仅是不满，而且认为东条内阁不倒，我国将无以自拔，从而致力于具体的倒阁运动。

东乡辞去外相后虽已在野，但因是贵族院议员，聚集了许多

新的政治家，其中有山本英辅海军大将及新闻界的人们，进行着各种策划。我所以了解，是因为东乡常用赤坂山王的星冈茶馆，并由我去预订。我曾问过这是什么会？东乡平静地说：‘东条那家伙尽胡来，大家很担忧，所以秘密地聚一聚，商量商量。’东乡倒阁运动的形式及其结果，我们外务省的下层职员虽不了解，但我觉得是够大胆的。

我是在任大东亚省中国事务局的总务课长时期，担任东乡先生的秘书官的。在那以前的5月25日的大轰炸烧毁了我在通往明治神宫正门道路左侧附近的家，我已无家可归，不得不借住于我的朋友，也是中学同年级同学的家。处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秘书官，可说是幸运的，因为外务省正好有秘书官办公室，我可以在此居住了。实际上秘书官也必须昼夜与大臣在一起生活。而且因为大臣是和平派、是军中强硬派注意的目标，所以大臣自己也常常变更居所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了。

我常常从大臣那里听到关于终战工作的说明，例如关于近卫特使的事，这是通过苏联进行的和平工作。后来表明苏联是不可信赖的。然而经过这一工作，通过苏联可以完全明了同盟国方面的意图。对此，大臣有自己的主张。东乡先生在参加铃木内阁以前，整个冬天呆在轻井泽，研究了各国的战败史。就是说，他已经在思考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了。

在当时，议论和平交涉的人们，大都按照常态考虑以梵帝冈教皇厅，或者瑞士、瑞典等中立国为机关。通过这些国家进行和平工作，乍一看是条良策，其实效果并不太好。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小国，不具备左右国际形势的力量。这些国家只有诉诸理性式影响舆论的能力，但在关键时刻，则没有改变大势的威力。东乡先生就这么认为。

我国目前所处的状况，所谓结束战争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情况不同。除非抓住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、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发言权的国家，与这一国家一起‘中央突破’，否则没有办法。

我想这是东乡在轻井泽研究战败史所得出的结论。他经常这样说：‘无论如何，通常的、普通的想法是无用的，明白吗？’

于是选择苏联作为居间调停国家。他指出：‘苏联尚未参战，是中立国。通过苏联实行和平，当然就进入了同盟国方面的核心，进入这一核心而能在中央突破，这是令人满意的。而且，我在任驻苏大使期间，也给苏联的要人们留下了相当的印象。’东乡之所以对苏联有信心，还有另外一层考虑。如果通过苏联，那么军队无论怎样反对和平，也一定不会阻拦，因为这时的陆军最害怕来自北方苏联的攻击。所以如果通过苏联，使得苏军不从北方出来，陆军也是愿意的。他想要把强硬的陆军拖入和平中，除此别无办法”。

外相辗转不定的寓所

大野胜巳氏继续说：“东乡是优秀的俄国通和德国通，但在考虑对苏工作时决不独断专行，就我所知，就有一些人参与了意见。我们的前辈尾形昭二也是俄国通，在东乡任驻德代理大使时，他在莫斯科，经常到柏林来向东乡提供关于苏联的情报与意见。这以后，尾形就成为东乡在对苏工作中的得力助手。在以终战为目标的对苏工作中，我曾偶尔看见过尾形的意见书。另外还有一人，是原岐阜县关市长的龟山一二先生，他是开战时的电信课长，也是俄国通，他的意见对当时的东乡也有强烈的影响。东乡虽有这些顾问，但他在充分地考虑他们的建议后，一旦形成自己的决定，则决不动摇。这一特点，在历届外相中，东乡最明显。

东乡被认为是陆军的对立面，然而在军人中他也有许多支持者。我想阿南先生也是其中一人，尽管最后东乡与阿南在立场上是那样对立。例如，吉田茂因近卫上奏文，而被宪兵队逮捕时（1945年4月15日），是东乡说服了阿南释放了吉田茂的。东乡所以要营救吉田，因为吉田是个人材，而且他是牧野伸显先生的女

婿，牧野与东乡同是鹿儿岛县人。但是，阿南如果不相信东乡，是不会如此简单地放人的。还有，最后也在瑞士从事和平工作的冈本清福中将(终战时自杀)，是东乡任驻德大使时的武官助理，他在任参谋本部的情报部长时，也常常与东乡联系。在海军，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中将与东乡的关系也极密切，常常悄悄地协助东乡的工作，例如，把海军塔雷斯工作的全部资料都提供给了外务省。

但是，无论是对冈本中将工作，或从海军获取塔雷斯工作的资料，东乡并不十分热心。如前所述，做和平的倡导者是极其困难的，因为这受国内对立面的掣肘和时机的制约。议和的萌芽刚出现就被扼杀，多次努力也无济于事，以至于转瞬之间，日本面临着彻底崩溃的危局。这时，《波茨坦公告》出现了，对苏工作也陷入了僵局，东乡想，到这地步总该罢休了吧。但是，既使对我国有利，总理大臣也不愿迅速推进和谈，要等待，再揣摸对方的意向，采取了‘置之不理’的政策！东乡是怎样地扼腕痛惜哟。‘干那样的事！’东乡先生那时沮丧而愤怒的神情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进入8月，大臣就开始了每晚必须频频更换住处的紧张日子。大臣隐藏其住处，我记得是在10日召开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之前。他在官邸被烧后，住在广尾的私邸里，这个私邸，处于有栖川宫纪念公园附近的一个死胡同内，所以万一有什么事，如果出口被封就很难逃逸了。

起先，通过警视厅从鸟居坂署挑了10多名巡警，这是些精于柔道和剑术的特别警官，当时通称为‘新选组’，为护卫私邸。既使那样，在私邸院后常有年轻将校、或他们所雇的青年人，揣着手榴弹在转悠，虽有强悍的警官护卫，但对方有武器，冲突起来结果就难说了。所以警方希望东乡尽量不要回家。这样到8月以后，东乡就辗转变更其住所。今晚大臣将在何处过夜，这对秘书官来说是一项重要的、又是令人担忧的工作。

当时的粮食是配给的，常常不足，既使在友人家借宿也不能空手而去，须带上晚餐与早餐的食粮。所以，我们事先把外务省免费供应的米，按大臣与我的份额装入小袋，再加上配给的酒和一袋干面包，外务大臣的份额也只有这么一些，每天把这些装入车子的行李箱内做好准备。一到傍晚，就为当晚的住处费神，当我与预先想好的住宅联系并得到许可后，就带着大臣前往，一般都是支持大臣的人家。这时不使用大臣的专车，而是使用外务省一般的车子，因为许多人知道大臣的车号。

当时，作为秘书官的我，安排晚上的宿舍是项重要的工作，但早晨一到机关，就翻译同盟国方面的外电，然后一齐送给内大臣木户先生。外电多的时候，因忙不过来，就让秘书室的人们一起干，一般就用铅笔写了。这是大臣指定的日常工作。重要的外电除送给木户外，还送给平沼等二、三个重臣。这项工作，在我之前的加濑也这么做。经过每天上午的联系，使重臣们对国际形势有相当的认识，也许有促进他们逐渐理解东乡先生的行动的作用。

我觉得，在这样的状态中，关于终战，东乡先生是在广岛落下原子弹的时候下最后的决心的，因为就在这时候开始每晚变更其住所的。”

苏联参赞的嘲笑

有人甚至认为，在终战前的那个阶段，通过苏联居间调停的和平工作，就象即将淹没的人所抓住的稻草；对此工作的怀疑至今仍未释然。尤其因为这一工作是国家最高机密，既使在推进这项工作的主角外务省中，也只有为首的几个人知其真相，所以就更难免有这样的感觉。当时与东乡外相一起直接参予其事的原外务省政务局长安东义良氏，就此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我们知道，在1945年，我国在军事方面也已完全处于四面楚歌之中，动

弹不得了。于是，根据东乡外相的意图，通过当时唯一的强大的中立国苏联斡旋和平，就作为国策在极秘密的情况下决定下来。外务省在具体着手此工作时，借重于原首相、外相、曾长期担任驻苏大使的俄国通——前辈广田弘毅先生，先由他悄悄地与苏联大使马立克接触。当时，马立克大使疏散到了箱根的强罗，广田也因东京的家被烧而去了强罗，因近邻的情缘，广田突然拜访了马立克大使，由此揭开了接触的序幕。这是6月3日的事情。

在此之前，作为对广田先生此次工作的侧面支援，我决定在箱根宫下的富士屋饭店，请苏联大使馆的华西里公使与阿涅诺夫参赞赴晚宴，刺探苏联的情况。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记不得当时的确切日期，但觉得是在广田、马立克会谈之前。阿涅诺夫参赞应邀前来，我们边饮边谈，互相揣摸着对方的心思。外交同行的聊天，总是围绕着一丁点儿话题翻来覆去进行的。外交官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忌讳把自己的弱点——哪怕是一点点——暴露给对方，而且，要谈的问题又是最敏感的。正当怀着这样的心情交谈时，不料，阿涅诺夫参赞以嘲笑的口吻如此说道：‘究竟，贵方的海军力量如何了？’即是说，日本残存舰队的情况怎么样了？那腔调与表情分明在说，你大概也不清楚，而我却知道了准确的数字！这纯是嘲弄！我沮丧得说不出话来。

怎么回事呢？据海军省军务二课课长未泽大佐挑明，处于穷途末路的海军，打算用残存的舰队——战列舰‘长门’、巡洋舰‘利根’、航空母舰‘凤翔’及几艘驱逐舰，与苏联交换带燃料的飞机，并擅自与苏联大使馆进行了接洽。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，海军竟另辟蹊径在暗中进行了。由此我才明白阿涅诺夫参赞那种对我嘲笑的原因，同时我更觉得我们通过苏联进行和平交涉，很难有做好的可能。因为在我们为此而努力的时候，另外的部门也在插手，苏联完全了解了我们的底细。海军关于用军舰换飞机的方案，我若一无所知也就罢了，可是事前却征询过我们的意见。我们认为这绝对不行，不仅外务省，陆军也强烈反对。海军也了解

这些情况并决定作罢，却没想到海军又违背了自己的承诺，悄悄地干起来了！

就日本军舰与苏联飞机交换之事征询我的意见，是在我从东乡外相那里正式得到对苏交涉的指示之时稍前。那时我任外务省的政务局长才两、三天，我是在1945年5月23日，从大东亚省的总务局长改任外务省的政务局长的。那天，内阁的迫水书记官长来电话，说‘陆海军的两军务局长对你有要紧话说，请立即到官邸去。’我一到总理官邸，陆军的吉积军务局长、海军的保科军务局长和迫水先生已等在那里，书记官长说：‘保科君似有要事相商，我们愿闻其详。’

于是，保科说：‘其实就是想用此方案试着与苏联谈谈。所以把大家请来……。’他的意思是说，要把我们残存的舰队全部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，交给苏联，去换取带汽油的苏联飞机。

这实属意外，我们大吃一惊。于是问道：‘虽是残存的军舰，但情况究竟如何了呢？’

保科说，实际情况如此如此，我们又吃了一惊。那般作为海军象征的战列舰‘大和’已经完了，是在4月7日去冲绳的途中沉没的。外务省也许通过外电才得知此消息。两、三天前我还在大东亚省，因为疏忽，一直不知道。现在只剩下战列舰‘长门’、巡洋舰‘利根’、航空母舰‘凤翔’及几艘驱逐舰了。说明白些，我方舰艇所剩无几、几乎等于零，听到这些数字，心中很悲哀。

我记得我就任政务局长后，所处理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有关保科局长的建议，从东乡外相处得到对苏交涉的正式指示是在此事的一周以后。那天大臣对我说：‘实际上我希望能与苏联谈一次……’，我马上明白了，这是要通过苏联进行的和平。当时，即使通过瑞士与瑞典这些中立的小国，结果也只能被迫唯英美是从、无条件地投降。这是东乡先生的观点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看来，应该从交战国之一，也是战争扩大原因的中国着手，但这在小矶时期已经弄坏了。不仅是小矶时期，对于中国，外务省过去也一

直在努力，大东亚省次官田尻爱义君在上海时也做了许多工作，但都失败了。现在即使再去中国努力，对方也不会认真谈论和平。于是，只剩下苏联了。苏联目前是中立国，又是能左右世界局势的强国。陆军最害怕苏军的参战，而当时苏军已开始远东频繁活动，虽说是谈判，除了苏联别无他择。能否成功则当别论，总不能束手待毙。选择苏联，就是这样考虑的。”

对苏补偿案的研讨

安东义良氏继续说：“根据外务省留下的记录和东乡先生在战后写的笔记，对苏交涉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决定的，时间是5月14日，是我进入外务省的前10天。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是由首相、外相、陆相、海相、参谋总长、军令部总长6人组成的，为了严守秘密，其他事务性人员一律不参予共事。他们经过了5月11、12、14共3天时间的讨论。

在会上，陆相首先发言，认为有必要探求防止苏联参战的外交方案。海相进一步提出，不仅要防止苏联参战，而且还要诱致苏联的好意，取得石油等供给（我从保科军务局长处得知，这需要通过军舰与飞机的交换而实现）。东乡先生发言说，有情报说美苏英三国首脑，围绕着德国战败后的处理问题，在波茨坦举行了会谈。在波茨坦会谈之后，再提出这样的建议就不行了，若要这么干，必须在此之前进行，现在为时已晚。对此，米内海相回答说，也许晚了，也许还不晚。最后，铃木总理说道，苏联有无好意，试探试探也无妨。

尤其在战后，苏联与美英必然处于对立地位，那时，苏联也不愿日本完全无力，由此看来又具有可能性。如就此在比无条件投降较好的条件下，导向讲和的国家而言，除苏联外，别无他国，对此6人的意见是一致的。

再就东乡先生看来，要把强硬的陆军引向和平，只有给陆军

以希望才有可能，只有如此，陆军才会认为有一试的价值，而下定决心。可是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必须给苏联以相当的赔偿，给哪些为合适呢？这就是会议最终的议题。结果决定：①把库页岛南部还给苏联、②取消日本持有的北洋渔业权、③开放津轻海峡、④把北满各条铁路的权利让渡给苏联、⑤承认内蒙为苏联的势力范围、⑥此外，根据情况，可以认可苏联租借旅顺和大连、不得已可让出千岛北半部分，以南满洲为中立部分，在中国本土树立日苏中三国共同体制为宜等。东乡将此起草成文件，以总理为首，与会的6人都签了名。

但是，这份文件在5月25日的轰炸中，与外务省房屋一起被烧毁了。于是东乡重作了一份文件，取来总理的印信，并通知与会者，6人都署了名。为什么东乡如此重视这一文件呢，有这份文件至少可说明讲和这件事，最初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作出的正式决定。就是说，东乡进入终战外交轨道，以此为证据，杜绝以后出现的非难。实际上，到今天，外务省仍认真地保存着这份文件。于是，东乡作为实际上的对苏交涉者，说服广田弘毅先生，作为与苏联接触的牵线人。但是，东乡先生关于最高首脑部决定的细节，对我一点没透露过。东乡先生说：‘既然要同苏联交涉，就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。退到甲午战争前的状况是过于苛刻了，希望至少停留在日俄战争前的状况，这是我们（米内、梅津、东乡）3人的意见。作为对苏交涉者，我想拜托广田弘毅先生与苏联大使馆联系，问题是如何深入下去。事情已开始着手，不知你有什么意见？’这是我从大臣那里第一次听到有关‘终战’的用词，所以还有些紧张。我稍考虑了一下，按常识作了这样的回答：‘这要估计到战后的情况，战后要确保日苏两国的持久和平。以此为基点，该给则给，该让则让，我方要决定以这样的态度去求得苏联的居间调解，不知是否妥当？’‘很对。’东乡说。‘米内君也如此认为。米内君的意思，似乎还要急切地请求苏联为居间调停。如果先和苏联人接触接触，看看苏联的态度，这想法我也赞成。因

为猛然请求苏联当中介，对方就容易了解我方的弱点。但要使交易多少能有利于我方，是不能让对方知道我方的弱点的。当然，如果失去机会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’东乡先生要我具体地检查一下哪些方面可以让给苏联。正如前述，最高方针已经确定，大臣对此并未提及，他想了解一下事务部门的意见。

我马上叫来承担苏联方面工作的政务三课课员曾野明君（以后是外交评论家），他是个极机敏的人，东乡先生也很信任他，因为不能说‘讲和’，所以我这样命令他：‘苏联已通告不延长《日苏中立条约》，这就有必要用别的途径和苏联建立永久的和平，这应该是苏联与日本都希望共同点。以此为目的，请马上考虑一下，哪些方面可以让给苏联。’两、三天内，曾野君就列出了一些方面，拟成文件拿到我这儿来了。细节已忘了，但在他的文件中，日本的地位是极微弱的。大臣的意思至少要保持日俄战争前的状况，所以在他的方案中加上了我的方案，作了修改，送给了大臣。这就是在广田、马立克会谈中所提出的内容。

此项内容的细节且不说，关键就是满洲中立化。就是说战争一结束，日本就从满洲撤军，然后日苏两国尊重满洲国的主权与领土，规定不干涉内政。再有就是如果苏联供给石油，则可以取消北洋的渔业权。第三条谈到，苏联若还有一些要求，可以进行协商。暂且决定就拿这个方案让广田先生向马立克大使试探情况。可是，如上所述，作为准备工作，我在箱根宫之下的富士屋饭店与阿涅诺夫参赞会晤，那时，海军已在暗中与苏联大使馆接触，试图用军舰换飞机，我方的内情，对方已完全了解，所以态度冷漠。对此，我在那时做梦也没想到……，但是却有那样的事！因此，广田与马立克的会谈就不会顺利了。

实际上拜托广田先生时，在外务省被烧毁的5月25日大轰炸中，广田原来住的家也被烧了，也不知道作为关键人物的广田到哪去了，后来好不容易从鹤沼的别邸找到。事情从一开始就很狼狈。广田先生于6月3日和24日两次拜会了疏散到箱根的强罗的

马立克大使，并把我所拟的文件交给了大使，但之后就不见下文。据说苏联方面接受本国训令，不用电报而用外交特使，结果苏联决定采用拖延之策。

这样，对苏交涉就势必搁浅。这期间，东乡先生还打电报催促在莫斯科的佐藤大使。到了7月份，因为这种方法过于迟缓，根据木户内大臣的提议，准备以天皇特使的形式派近卫去莫斯科，在这犹豫未决的时候，《波茨坦公告》发表了，形势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总之，终战前夕的我国外交，就是向苏联求情，至少把90%以上的精力集中在苏联身上。

无论如何，政务局人员的素质虽然极好，但在广田交涉、近卫特使等问题上，由于是最大的国家机密，所以对课长们也没说。当时，我每周一次，向总理和陆、外、海相外的各省大臣通报外交情报。陆军方面来的是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有末精三中将，海军方面来的是谁现在已忘了，也是相应的人物，虽然主要是说明军事情况，但大臣们还是要打听与苏联的关系，看来他们也都隐隐约约知道一点。由于东乡先生嘱咐我这是绝密中的绝密，必须保密，所以我就以此问题请直接去问外务大臣为托辞回避了。为此，无任所大臣左近司中将和情报局总裁下村先生，狠狠地瞪我，显出不愉快的表情。东乡先生说，即使是阁僚也不能说。这虽然很使人为难，但有东乡先生的命令，不得不如此。”